我的叔叔邹志安

余党会

周末去了一趟久违的复旦书店，就是一进复旦大学校门从右手边狭窄通道进去的那一个。其间陈设依旧，没想到我却收获到了意外的心情。在一本书的封面我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邹志安，原来是百花文艺出版社新出版的“百花奖”入围作品集，一共四本，有两本收录了邹叔叔的作品，我都买了下来，一本我自己用来怀念，一本打算邮寄回家给我的父亲，我觉得他一定会想知道这件事情的。

我称邹志安叔叔是因为我父亲有幸是他的老友，而我自己最多只见过他三次面。第一次忘记是在什么地方了，当时我还很小，很害羞，只是在父亲的促导下叫了一声“叔叔”；第二次是在县医院父亲的办公室里，他人很瘦，脸色用现在的话来说肯定是亚健康，但是一双眼睛却似乎能穿透无限的时空，个子有些高，走路时上半身左右地晃动；第三次见面是最难忘的，那时候叔叔已然是礼泉县的县委副书记和陕西省作协的一级作家了，我和父亲搭他的专车从县城去省城西安，那是我第一次坐小轿车，自然是非常的欣喜不安，但还是悄悄地坐在一边听父亲和叔叔交谈。他们终于谈到了我，父亲告诉他我也是很喜欢文字的，能背诵不少古诗。叔叔说，“背一首我听一下”。那时候车子刚出了咸阳，过了渭河大桥，我就说了“兵车行”里的“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吆！这娃还行”，叔叔说，“要多读些，给后锅多准备些汤”。在陕西关中地区，农家的锅台上一般都有两个锅，一个是前锅，用来做饭，一个是后锅，用来给前锅准备热水和其他半成品的。叔叔说给后锅多准备些汤就是打好基础的意思，如果后锅没汤了人们就得去充电，作家就得去采风了。后来“后锅没汤了”这句话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思维的方式和发展。这一点连我父亲也不知道，叔叔也许就更想不到了。仔细想想，有很多故事其实都是这样的。再后来，有一天父亲回家给我一枚金属人头像章，说是俄国诗人普希金，是叔叔出访当时的苏联时带给我的。

叔叔的老家在礼泉县城东的一个村子里，父亲告诉我叔叔初中毕业考试考的很好，原本是可以上高中的，但由于家里穷，和别人作了调换，把上高中考大学的机会给了别人，自己在隔壁的乾县城里上了乾县师范学校了。叔叔毕业后在村子里教了几年书，而后到县文化馆工作，叔叔和父亲就是在这时认识的。那时父亲从北京的一家医院调回到县城的医院工作，但还是放不下手中的笔，于是便和叔叔成了朋友。叔叔作为县委副书记，非常关心县里文化人的生活，父亲就是受益人之一。在父亲的一篇文章受了什么奖以后，叔叔便积极地对县里的相关人员说了县人民医院有父亲这样一个从北京调回来又喜欢文学的人，可是爱人和孩子都还在农村。他知道父亲是碍于情面的人，于是亲自和父亲医院的领导进行交谈，接着又出面给县民政局、公安局等单位打招呼，最终母亲、弟弟和我便“农转了非”，把村里的人羡慕得掉出了眼泪。在知道父亲和县委副书记认识以后，医院的领导还顺利地给母亲安排了一份工作，从此母亲便成了自己做梦都想成为的“干部”。直到现在，尽管母亲早已下岗，但每每提及此事，她还显得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其实我并没有看多少叔叔的文字，在我记忆里的只有《支书下台唱大戏》、《哦，小公马》、《关中异事录》几本，还有一篇被用于2001年全国高考试题的散文——黄土。叔叔的作品主要叙述陕西关中农村生活中的故事和文化，撩起人们的思索。从叔叔的作品里我也许并不能体会出更深的东西来，但我对叔叔的文学有一个印象，这个印象用一个字来说就是“土”，土得就像刚从黄土地里钻出来的，只有深深体味了黄土味道的人才会有那样的气味，那气味因为细腻而生动，因为实在而平静，可惜更多的人并没有机会嗅到。

然而生活总是那么的参差，农历1992年的冬天，噩耗传来，叔叔身患不治之症而英年早逝。陕西文学界刚失去了路遥，又失去了叔叔这样一位战将，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悲痛和感叹。我母亲念念不忘“农转非”的事情：“为什么这么好的人走得这么急了”。父亲问了一句“这是怎么去了？”而后再也没拿笔了。

后来在我读大学时期的一个假期，父亲带我去叔叔西安住所看望叔叔的老母、爱人和孩子。房子不大，于是没有专供叔叔写作的地方，就在那幢楼下的一个通道里，父亲指给我看一个用青砖砌起的小屋，高不足两米，有两扇极小的门，父亲说那就是叔叔写作的地方。我从门缝里望进去，里面隐约有一张旧桌子和一把椅子，而面积约有三个平方米了。

天涯小楼随笔（三）

陈茗屋

钱君匋老师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内心充满了委屈。他写了一封长信想呈戚本禹，欲求其施以援手。并刻制了一方戚的姓名印以赠。戚当时是中央要员。钱老师深恐措辞有不当处，故先请挚友邹若军先生提点意见。邹读了一遍说，马上撕掉，万万不可，这种人物今天在台上，明天也许就跌落台下，不可信任不可信任。当时我也在场，目击了整个过程。老师听后，马上撕碎扔入废纸篓中。“戚本禹”印则并未磨去，不知还在人间否。

不料只过了几十天，戚本禹突然成了反革命，被打翻在地，消失了。

邹若军先生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钱老师在嘉定外岗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班的同学。当时同班还有歌唱家蔡绍序等十余人。结业以后，老师命我去朵云轩买了十方二毛钱一方的青田石，打磨漂亮，一人赠以一方姓名印。俱收录在老师的《海月盦印賸》中。邹先生是新闻工作者，当时任《文汇报》国际版的编辑。

钱老师还刻过“康生”、“三洗堂”的对印，以及稍大一些的“曹轶欧”（康生之妻），想请郭沫若转呈之。并刻了一方秦印风格的“鼎堂”送郭沫若。不知什么缘故，四方印章现在竟然收藏在桐乡“君匋艺术院”。

这四方印，可以说是钱老师的代表作品，俱极为精彩。尤其是“鼎堂”。

◇ ◇ ◇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经常去拜访陶冷月丈。他和郑逸梅、叶潞渊、王哲言诸丈俱为苏州人。这几位老先生，是我常常怀念，并影响我一生的高洁之士。

冷月丈一口苏州风的上海话，轻轻柔柔，没有一点点火气。他的冷艳的山水夜景，至今仍大受藏家的欢迎。他酷爱印章，请许多大名家篆刻。他又想出许多好句子作为闲章。曾请钱老师刻过“故乡第二是三湘”，令我馋涎直流。

听说冷月丈年轻时经常外出写生、创作，深感印章沉而不便携带，便请人制作了许多比三十二开书籍还小的红木扁匣，亲自将印石锯开，打磨成一公分高的扁印，七巧版似的嵌贮于匣内。老前辈中，也仅此一家而已。

我常去拜访时，冷月丈已是皤然一老。他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但在谈吐中，从未有愤世嫉俗的言辞，平和恬淡如古井之无波，对待年轻人又热情诚恳。郑逸丈、潞渊丈、哲言丈也都如此。我对老一辈的苏州人充满敬意。说句笑话，我是浙江宁波人，但对于我浙江人，真该说一句对不起。当然，也有像来楚丈那样德艺双馨的伟大艺术家。

冷月丈身后，介绍其生平和艺术的出版物，好像都是其哲嗣为衍兄操办的。为衍兄不是富人，也不叨光射利。费心费力弘扬冷丈的艺术，让现在的年轻一代，知道上世纪出现过一位杰出的新中国画大师，令人十分感动。

神机妙趣逸品出

丁旭光

徐庆华是一位纯粹的艺术家，他日复一日地晒着他的艺术生活：在微信里常年与大家分享篆刻、书法、绘画、雕塑、陶瓷、摄影等艺术作品，有具象有抽象，且日展日新。

从近朱到了一，从三省斋到一斋，从佛而道，是徐庆华心路历程和艺术活动的生动写照。徐氏最出彩的行为艺术之一，是书斋文化走向展厅艺术的一次实践：上海交通大学建校120周年之际，在一连串声势浩大的庆典活动中，堪称压轴大戏的应该是纪念大会上，全国五所交大的校领导共同在长卷《交通大学赋》上钤盖“交通大学印”——用古雅的篆刻与书法向120岁学府传统致敬！仪式感十足又充满人文气质。而值得一提的是，这幅长8米的巨幅狂草《交通大学赋》和一方古朴庄严的“交通大学印”，全都出自徐庆华之手。长卷《交通大学赋》，是在20张丈二宣纸拼成的120平方米巨幅纸面上，以狂草书写而成。

走进徐庆华的工作室，从桌上到地上都堆满了各种笔墨字画。其中，有如狂草般的写意水墨，亦有无序线条组合的抽象油画；除了壁画和浮雕，甚至玻璃和陶瓷，都成为徐庆华书法艺术的载体。而站在这些繁杂而丰富的作品之中的徐庆华，也因此一直以来都难以被界定身份。徐庆华喜欢从不同的艺术门类中寻找灵感，他把书法篆刻的元素融入至其他艺术门类：他的瓷艺创作、抽象画创作乃至壁画、雕塑创作都不同凡响，博涉众域而无玩味之意。

徐庆华的篆刻，于红白对比、方圆呼应中展示其匠心独具；从审美大效果着眼，于细微处尽显天然；夺人耳目，耐人寻味。呼之欲出的，是现代美的意味隽永，古典美的自然和文人雅意。

轰轰烈烈一瞬间，不是徐庆华的追求，徐庆华向往的，是细水长流一百年。徐庆华的书风是在“工整”中显雄放。他的书风得益于印风：印石因受制于方寸，只能在限制中表现。徐庆华把限制转化为草书上的控制。于是，他的草书刚则铁画，媚若银钩，壮则撅吻，一眼虽可览尽，墨香三春依然。观徐庆华草书，有一条美的弧线自王维的水田中逸出，让人心弦屏息，随后，发一声裂帛而诗。

近年来，徐庆华醉心于具象抽象一体的中国“线”。中国“线”的抽象，基于书家线条的表现，流畅灵动圆融，华丽的表象下是审美哲学的诠释，充满了东方智慧之美！《书非书·神会傅山》是徐庆华的中国“线”代表作。《书非书·神会傅山》里，有抽象的丰富线条，有必须神会的狂草精微。而眉宇间和目光中都透着精微之气的徐庆华，有山林中秋水般的澄澈。夜阑人静，一灯如炬。徐庆华是一盘炭火，一壶清茶，一册古书，把自己交给了千金不换的俯仰之间。

平正的正楷和奇放的狂草，是徐庆华书法创作的常用书体，他在相反相成的风格之间游走，营造出了正奇相生的艺术特色。徐庆华正奇相生的严谨与开放，应是学院派艺术家背景使然。传统与现实、东方与西方，都在徐庆华的视野之中——有如登高望远，水天一色。

孔雀紫藤 （中国画） 夏佩明

纪念音乐家任光

任溶溶

蔡楚生导演，描写旧社会渔民苦难生活的电影《渔光曲》，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电影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我有幸在上海文史馆遇到该片演员何非光老先生，他给我讲过去拍默片的故事。他是台湾人，因为国语讲得不标准，所以有声片一流行，他就退出影坛，改做别的工作了。

《渔光曲》虽是默片，可是它的主题曲却非常流行，极受欢迎。我到现在还能哼出整首曲子，可是歌词就只记得开头两句了：“云儿飘在海空，鱼儿游在水中。”这首歌的歌词是安娥写的，曲子是任光（1900–1941）作的。

抗战爆发后，任光同志到皖南参加新四军。我于1940年到苏北参加新四军，后来听到任光同志牺牲的消息。当时传说任光同志在文工团，有一次演出，用作道具的手枪没有把实弹取出，戏中向他射击，任光同志就不幸中弹牺牲了。这真是件悲惨的事。苏北新四军一直是这么传说的。但我最近查资料，知道任光同志却是牺牲在皖南事变中。他牺牲时年仅41岁，太不幸了。任光同志还创作了《打回老家去》《王老五》《月光光》等极有影响的曲子。

新西兰雅 芳河泛舟

王万里

激滟清波鸥鸟浮，
弟兄姐妹共一舟。
橄红橡阔银蕨绿，
贵有亲情岁月稠。

① 雅芳河，总长约十四公里，流经基督城，将城市一分为二；这条与英国同名的河流贯穿着两岸最美丽的风景，使这座城市成为『英国之外最像英国的城市』。② 银蕨，是新西兰的国花，从前的毛利猎人和战士都是靠银蕨来认路回家的，因为只要将其叶子翻过来，银色的背面便会反射星月的光亮，照出穿越森林的路径，新西兰人认为银蕨体现了他们的民族精神。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

王珮瑜

时光飞逝，收获满满的2018年还意犹未尽，2019年的脚步就已走来。在每一次旧岁与新年、飞雪与春花的交集处，有诸多回望和感慨，也有更多的希冀和期待。

作为从事传统艺术的文艺工作者，我的本职工作和自我要求，就是在专业上不断精进。在过去的一年，为抢救传统骨子老戏事业我出了自己的力，学习了京剧《汾河湾》《法门寺》，昆曲《四声猿·骂曹》，并用半年时间展演六出老戏，在院团领导、前辈老师和观众的支持下，获得了积极的反响。抱着教学相长的心愿，我也完成了为青年演员传艺授课的工作。对演员而言，学习和体验是一生不能停止的事情，唯有立足于传承，才拥有为行业、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的可能。在新的一年里，我将一如既往地刻苦练功、投师访友，为京剧行业和广大观众带来更多的好作品。

除了传承，更为大众所关注的是京剧的传播。从年初的《经典咏流传》到年末的《国家宝藏》，我始终有意识地在更广阔、更优质的平台上，传播有关京剧的一切。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特别日子里，开拓传播方式、不断尝试新的可能，对我这样一个改革开放同龄人而言，似乎也有着特别的意义。但我深知，所谓的“话题度”只是一个外在的过程，重要的是要真正吸引大众关注京剧，关注传统文化艺术，走进剧场，切身感受京剧艺术的魅力。有了更多的观众，戏曲行业就有了源头活水，传承和传播才有存在的价值，才有不竭的动力。

为了进行更深入的传播，在今年，我们的京剧教育事业也开始了征程，并做出了初步的成果。在多年来数百场“瑜乐京剧课”的实践中，我认识到了京剧教育普及工作既是迫在眉睫，又是势在必行。同时，作为上海市第十五届人大代表、妇联第十五届执行委员会委员，积极建言献策，关注青少年儿童的京剧普及教育，做京剧及戏曲艺术的“志愿者”，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我们编订了第一套青少年京剧通识教材，组建了青年教师团队，与上海市五区十几所学校达成了初步合作。在新的一年，我们希望更多的学校、教师、学生、家长，能够把京剧加入学生艺术兴趣选择的菜单，能够通过“唱念做打”的方法，达到身心的协调统一，能够在京剧世界里，感受传统文化，提高艺术修养。

“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年年心怀愿景，年年脚踏实地。新春之际，愿我们的伟大祖国繁荣昌盛、长治久安，愿梨园行蒸蒸日上、薪火相传，愿每一个正在奋斗的平凡人，我们的美好心愿，都能成为壮美的景象。

十日谈

新年新愿

责编：殷健灵

文学的写作富有创造性，被文学眷顾，是一种幸运。